

焦陂塘兴废考 ——兼及焦陂镇

焦存超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焦陂在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焦丘、椒陂等多种称谓。其最早可能兴建于三国正始年间,中经唐柳宝积和宋欧阳修、苏轼的几度修治,灌溉和交通功能在北宋时达到最佳,从而带动了位于陂塘之侧焦陂镇的繁荣。此后,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焦陂塘在清初时基本废弃,焦陂古镇也因此衰落。

关键词: 焦陂塘; 焦陂镇; 兴废

中图分类号: K825.81;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5)06-0134-05

Study on Vicissitudes of Jiaobei Pond

JIAO Cun - chao ,CHEN Yen - 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Jiaobei had different appellations ,such as Jiaoling ,Jiaoqiu and Jiaobei(椒陂)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possible that Jiaobei pond was originally founded in Zhengshi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Dynasty. After it was repaired by Liu Bao - ji ,Su Shi and Ouyang Xiu ,its irrigation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ring prosperity of Jiaobei Town ,a town near Jiaobei Pond. From then on ,because of natural ,factitious and other factors ,Jiaobei Pond was basically out of u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refore ,Jiaobei Town declined.

Key words: Jiaobei pond; Jiaobei town; vicissitude

陂塘,《国语》云“陂塘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蓄水曰陂,塘也。美,谓滋润也。”^①王祯《农书》亦云:“《说文》曰:陂,野池也,塘犹堰也。陂必有塘,故曰陂塘。《周礼》:‘以渚蓄水,以防止水。’说者谓‘渚者蓄流水之陂也,防者渚旁之堤也。’今之陂塘,即与上同。”^②可见,陂塘是古人在天然湖泊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水利设施,其主要功能在于蓄水和灌溉,“所谓湖塘陂堰者,于天时,无雨则可由沟以蓄,而田可施灌溉之功”^③。其灌溉农田的能力视陂塘水域面积大小而各异,“溉田,大则数千顷,小则数百顷”,甚者“可足溉田由千万”。此外,陂塘还有其他优点与功效,如“比作田围,特

省工费,又可畜鱼鳖,栽种菱藕之类”^④。历史时期的淮河流域,面积不一、形态各异的陂塘星罗棋布^⑤,尤以

①《国语》卷3《周语下》及韦昭注,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5页。

②④王祯《农书》卷18《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56页。

③嘉靖《颍州志》卷9《沟洫》,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⑤参见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87页;吴海涛《古代淮北市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水域浩淼的芍陂和鸿隙陂最为著名,因此也广受学界关注^①。作为一处水域较小的陂塘,历史上的焦陂位于今安徽阜阳境内,文献多以“焦陵陂”、“椒陂”等名之,并云其面积“广十余顷”,可“溉田万亩”^②。该陂塘今虽无存,但在历史上曾存在并为人所用 1500 余年,其蓄水灌溉和水运功能对皖北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欧阳修曾作《忆焦陂》,对之多有称颂。同时,陂塘附近有座与之同名的古镇,亦曾兴盛一时,学界对历史时期的焦陂塘及焦陂镇缺乏基本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方志等文献,拟对焦陂的兴废状况作初步考察。

一、焦陂与椒陂:名谓沿革考

焦陂塘在文献中最早的称谓是“焦陵陂”,见于酈道元《水经注》淮水篇“淮水又东北,左会润水。水首受富陂,东南流为高塘陂,又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陂水北出为陂。”^③清人杨守敬等曾据酈注,把《水经注》所述河湖绘制成图。将杨守敬等《水经注图》中所绘的焦陵陂位置(图1之左图)与正德《颍州志·州图》(图2)相对照,我们发现,杨图中焦陵陂(焦湖)与正德《颍州志·州图》中椒陂塘恰处在同一位置,即皆位于汝阴(颍州府)城“南六十里”^④,且两图中的焦陵陂(焦湖)和椒陂塘均有水道直达府城。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水经注》中的焦陵陂(焦湖)即是后世文献中的椒陂塘。相关文献对此也有明载,如道光《阜阳县志》“椒陂塘,县南六十里,广十余顷,即《水经注》之焦陵陂,旧作塘”^⑤;同治《颍上县志》“《水经注》:‘润水首承富陂……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焦陵,即今阜阳焦陂,唐焦亦作椒也”^⑥。可见,《水经注》之焦陵陂(焦湖)即是后世所谓的焦陂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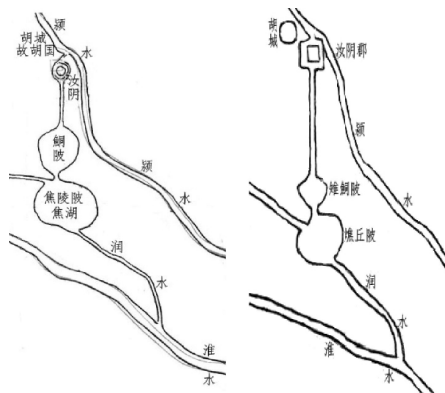


图1 焦陵陂(左)和焦丘陂(右)位置对比图

说明:左图据杨守敬等《水经注图(外二种)》(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0页)改绘;右图据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形图》南3卷中《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总论分典》,西泠印社2012年版,第2537

页)改绘。

然而,在《魏书》中,焦陂塘则被称为“焦丘”,“胡城……有焦丘、雉陂二陂”^⑦。关于胡城,《太平寰宇记》“汝阴县”条载“胡城,在县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子国也。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胡国,汝阴胡城’是也。”^⑧据此可知,旧胡城在汝阴县城西北二里处,两者相距甚近。因此《魏书·地形志》云胡城有二陂,即谓汝阴有焦丘、雉陂二陂。嘉庆《大清一统志》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山川》“椒陂”条皆引《魏书·地形志》文作注,“椒陂,在阜阳县南。《魏书·地形志》:‘胡城有焦丘、雉陂二陂’……旧志椒陂即焦陂也。”^⑨其意谓焦丘和雉陂中的一处陂塘即为后世称之为的焦陂塘。那么,究竟是焦丘陂抑或雉陂才是焦陂塘呢?这里,我们将杨守敬等《水经注图》所绘焦陵陂位置所在(图1之左图)与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形图》所标注的焦丘陂和雉陂位置图(图1之右图)相对比,不难发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形图》中位于汝阴郡城南方的焦丘和雉陂的位置,分别与《水经注图》中郡城南方的焦陵陂(焦湖)和陂的位置相对应,即焦丘陂对应焦陵陂(焦湖),雉陂对应陂。而据前所考,焦陵陂(焦湖)即为后世文献中的焦陂塘,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魏书·地形志》中所记的焦丘

①相关成果主要有徐义生《关于楚相孙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刘和惠:《芍陂史上几个问题的考察》,《安徽史学》1988年第1期;陈立柱《结合楚简重论芍陂的创始与地理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韩光辉、向南:《〈水经注〉所记“鸿隙陂”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陈业新《历史时期芍陂水源变迁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②④正德《颍州志》卷1《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③酈道元著、陈桥驿注《水经注》卷30《淮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

⑤道光《阜阳县志》卷2《舆地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⑥同治《颍上县志》卷1《舆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⑦《魏书》卷106《地形志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62页。

⑧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1《河南道·颍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9页。

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128《堤堰》,四部丛刊续编影旧抄本;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31《山川》,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陂即是后世的焦陂塘。

《新唐书》载“颍州汝阴郡……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①。可见 焦陂至晚在唐代又有“椒陂塘”之名。宋元时期的文献中焦陂的称谓多不一致 欧阳修及苏轼的诗文中多用焦陂 这也是所见文献中最早出现的焦陂之名 但北宋中叶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又载“汝阴。五乡……椒陂、栎头四镇。”^②《金史》亦载“颍上……镇十 永宁……椒陂。”^③所以 宋元时期虽然用焦陂 但同时亦沿用唐代椒陂之称。明清时期的各类文献多沿袭宋元时期的称谓,“焦陂”、“椒陂”互用。综上可知 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焦陂有着不同的称谓,从汉魏时期的焦陵陂、焦丘陂等诸称,中经唐代,最后在宋元时期确立了焦陂和椒陂的称谓。

焦陂在各类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焦湖、焦丘、椒陂塘等多种称谓 因而容易使人将之与区域内的其他陂塘相混同。如有学者就认为高塘陂与椒陂塘为同一陂塘^④ 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如前所述,汉魏以后各类文献记载均以《水经注》中焦陵陂为椒陂塘,而未有指高塘陂为椒陂塘者;其二,按前引《水经注》记载,润水到达富陂后,接着往东南流至高塘陂,之后才汇集至焦陵陂。焦陵陂即是椒陂塘,故可确定高塘陂和椒陂塘是位于润水之上两处不同位置的陂塘,高塘陂位于椒陂塘上游,两者并非同一陂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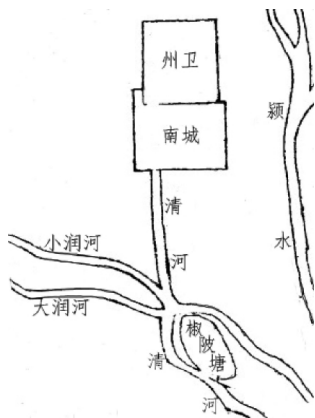


图2 正德《颍州志·州图》中椒陂塘位置图

二、焦陂塘兴废考

关于焦陂塘的具体位置,按前引《新唐书》记载,应位于当时的汝阴郡城南 35 里处。但是,明清皖北有关方志的记载与此有所出入,或云在州南 60 里者^⑤,或云距府城 40 里^⑥。尽管记载有所差异,但总体出入不大,大致位置可以基本确定,即焦陂塘位于距明清时期的颍州府城以南大约 35 里至 60 之间的润河水系上(见图 1 和图 2)。

136

据邹逸麟统计,周秦至西汉时代,华北大平原上见于文献记载的湖沼有 40 余处,而事实上秦汉时期黄淮海平原上存在的湖沼数远不止此,这些湖沼多是由洼地积滞而成的天然湖沼^⑦。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颍州境内则开始出现了众多人工修建的陂塘,就连东汉设县也以“富陂”为名。对此,《十三州志》记云“汉和帝永元九年(97 年),分汝阴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⑧“多陂塘以溉稻”,说明古人多将天然湖沼改造成用以灌溉农田的陂塘。颍州古时又称汝阴,因陂塘众多而于汉和帝永元九年(97 年)专置一县,冠名富陂,说明此时汝阴境内就已存在着众多陂塘,但焦陂是否也在其列,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公元 3 世纪的曹魏时期,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正始四年(243 年),司马懿命邓艾在淮河流域屯田,邓氏乃“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⑨,焦陂是否就在此时修建,文献中也无明确的信息。到了北魏时期,焦陂才以焦陵陂的称谓正式见于《水经注》。据此可以确信,焦陂塘至少在《水经注》的时代既已修建。但据邹逸麟研究认为“《水经注》记载汝颍之间有数十处连珠式的陂塘,很可能就是邓艾时兴建的遗迹,或者是曾被其利用过。”^⑩这一推断基本符合史实。因为:其一,《水经注》虽最早记载焦陵陂,但郦氏也并无说焦陵陂何时由何人所建,这只能说明在其之前焦陂塘就早已修成;其二,从邓艾在颍州大兴陂塘之后到郦道元时期的文献中,尚未发现该地区有大规模兴修陂塘事件

①《新唐书》卷 38《地理》,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987 页。

②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 1,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6 页。

③《金史》卷 25《地理中》,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98 页。

④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47 页。

⑤正德《颍州志》卷 1《山川》;嘉靖《颍州志》卷 9《沟洫》;康熙《颍州志》卷 1《舆地》,康熙五十五年刻本;乾隆《颍州府志》卷 1《舆地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道光《阜阳县志》卷 2《舆地志》。

⑥成化《中都志》卷 2《山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 1990 年版。

⑦⑩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6—248、254—255 页。

⑧闾骊著、张澍辑《十三州志》,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6 页。

⑨《晋书》卷 26《食货》,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85 页。

的记载,焦陂塘在这段时间内修建的可能性极其微小。综合分析,并结合前引《晋书·食货志》的记载,将焦陂塘兴修的最早时间追溯到曹魏时期应该不存在很大问题。由此推断,焦陂塘可能最早于正始年间(240—249年)由邓艾主持修建。

及迄唐朝,因陂塘淤圯,国家组织人力对焦陂塘进行史料记载中的第一次修治。《新唐书·地理志》:“颍州汝阴郡……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①然而,后世不少文献在载录此一史实时,多将“修”改为“开”。如《读史方輿纪要》:“椒陂塘,在州南三十五里。唐永徽中刺史柳宝积所开,引润水,溉田二百余顷。”^②又如乾隆《江南通志》:“椒陂塘……唐永徽中刺史刘宝积(此处讹误,应为柳宝积)所开,引润水,灌田二百余顷。”^③虽仅一字之差,但“所开”则意味着焦陂塘最早为柳宝积修建,但事实上,永徽年间颍州刺史柳宝积只是对焦陂塘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扩修。因为如前所述,焦陂塘最早可能在曹魏正始年间由邓艾所修,最迟亦不会晚于北魏时期,早在唐代柳宝积任颍州刺史前就已存在,《水经注》(淮水)又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陂陵”^④的记载也可证之。而且清代杨守敬早就明确地指出了永徽年间焦陂水利工程的性质“《唐志》,汝阴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修,盖修其故道耳。”^⑤“修其故道”不仅明确了工程的性质(“修”),而且明示了工作的内容(“修其故道”)。根据方志记载,永徽四年(653年)颍州境内发生了一次较严重的旱灾,“高宗永徽四年,夏、秋旱,光、婺、滁、颍等州尤甚”^⑥“永徽四年夏,汝阴、颍上、霍邱旱。”^⑦可能正是此次严重的旱灾,让时任颍州刺史的柳宝积决心对焦陂塘进行扩修,以便能够平时多蓄积水以备干旱之时救急。由此,我们推知柳宝积对焦陂塘扩修的具体时间可能在永徽四年至六年(653—655年)间,由于唐高宗永徽纪年只有6年,所以最迟不会晚于永徽六年(655年)。

北宋时期,欧阳修及苏轼相继守颍,二人皆对颍州的河渠陂塘大力整治,其中就包括对辖境内的一条人工开挖的河道——清河——多加疏浚,“宋皇佑、熙宁间,欧、苏两公相继守颍,益加浚治。”^⑧尤其是苏轼“乞留黄河夫万人浚湖并境内沟洫”^⑨,并在清河水系上置三闸,“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⑩三闸的作用是对清河“以时蓄泄”^⑪。清河南连淮河,北抵府城,中穿大小润河和椒陂塘(见图1和图2)。疏浚后的清河交通便利,舟楫往来穿行其间,北达府城,南抵淮河,发挥着重要的水运功能。夏季来临,塘内荷花满陂,荷香四溢,水中栖息着各种丰富的淡水鱼类,渔产丰饶。陂周农人引水溉田,农业颇获丰收;商人收购余粮酿造美酒换取金钱,商业氛围甚为浓厚。这些反映了焦陂塘区域一幅清平盛世、农业繁庶景象,印证着此时期陂塘的水运和灌溉功能之兴盛。

金元易代,颍州地区战火频起,此时期的文献中虽无维修陂塘之明文,但大致可以推断焦陂塘仍在使用。因为从欧阳修和苏轼在北宋皇佑、熙宁年间(1049—1077年)对焦陂塘进行修治,到对之再加修葺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其间共400余年,倘若焦陂塘在此间早已湮废不用,那么曾在成化年间任颍州同知的刘节便不可能再度对焦陂塘进行修治,“刘节,庐陵人,成

①《新唐书》卷38《地理》,第987页。

②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1《南直·凤阳府》,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0页。

③乾隆《江南通志》卷62《河渠志·水利》,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④郦道元著、陈桥驿注《水经注》卷30《淮水》,第475页。

⑤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7页。

⑥嘉靖《颍州志》卷1《郡纪》。

⑦乾隆《颍州府志》卷10《杂志·祥异》。

⑧乾隆《颍州府志》卷9《艺文志》。

⑨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67《河渠志》。苏轼《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诗尾自注云“予以颍人苦饥,奏乞留黄河夫万人修境内沟洫,诏许之。”参见《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苏轼诗集》卷20,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374页。

⑩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苏轼诗集》卷20,第374页。

⑪乾隆《颍州府志》卷1《舆地志·山水》。

⑫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9《忆焦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5页。

⑬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9《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第144页。

化十三年由贡士同知颍州事,修清白陂、焦陂等堤”^①。而且在由刘节主撰的正德《颍州志》之《州图》中,椒陂塘仍被清晰标注(见图2)。因而,到明中叶焦陂塘仍在发挥着蓄水灌溉的功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元明时期,黄河频频南决,明代黄河干流多次夺颖入淮,黄水泛滥颍境。《明史·河渠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而贾鲁故道遂淤。”^②这是黄河干流首次夺颖入淮,此后又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弘治二年(1489年)、嘉靖十二年(1533年)及明末,黄河主流多次夺颖入淮,颍河成为全黄南下的干流^③。众所周知,黄河水质含有大量泥沙,其泛滥之处,泥沙淤积,极易造成湖沼湮废。黄河长时间将颍水作为干流,颍水河道狭窄,颍水全河难容黄河汹涌的水势,黄水势必泛滥颍境,由此使得位于颍水流域的焦陂塘在颍州同知刘节于明成化年间最后一次修治后渐遭黄河泥沙的淤积。清初,顺治和康熙时期的两部《颍州志》中皆无焦陂塘已遭废弃的文字记载,可以说该塘虽渐遭淤积,但仍尚可使用。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焦陂塘已遭废弃的文字明载于坟籍:“椒陂塘,郡城南六十里,广十余顷,唐刺史柳宝积教民置陂,引润水入塘,溉田万顷,欧阳公诗作《焦陂》,当时自城舟行,由清河可达焦陂,今塘已废。”^④可见,自明以来,由于黄河屡次泛颖,加上成化后久无修缮,焦陂塘减趋淤积,以致到乾隆初年,焦陂塘终遭湮废,彻底失去了其蓄水灌溉的水利功能,从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焦陂镇的兴衰简史

关于焦陂镇位置,按正德《颍州志》的记载,“在州南六十里润河上”^⑤,该志所载焦陂塘位置同样“在州南六十里”^⑥。据此可知,焦陂镇位于焦陂塘附近。

作为一座古镇,焦陂镇的历史亦相当久远。明成化《中都志》记载当时的焦陂镇附近有一座古城遗迹:“古城二:一在州东南椒陂镇,一在州西阳桥下流。”^⑦正德《颍州志》亦有相关记载:“古城二:一在州东南椒陂镇东二里……置小衙门也。”^⑧嘉靖《颍州志》亦载:“古城:州南椒陂镇有二城。”^⑨这些记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一,明成化至正德年间的焦陂镇附近存在着一座城池废墟;其二,古城废墟的轮廓是座城池,说明此地曾经筑有城池,而城池在古代一般为该区域的军事或政治中心。由此可知,焦陂之地曾经成为该区域的统治中心。至于这座古城为何时所建、何时毁弃,后世文献皆无明确信息,故不可详考。但可以这样理解,焦陂古城废墟的存在不仅说明焦陂镇的历史相当久远,而且从侧面反

映了焦陂镇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正德《颍州志》对当时的焦陂镇亦有所记:“椒陂镇,在州南六十里润河上,前代置镇,有碑存,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乙卯立石,推知置镇又在立碑之前,今镇废而規制尚存。”^⑩该志又另记:“椒陂镇碑,宋置,在废镇西佛寺塔边,剥落难辨,宋云:宝元二年乙卯许平立石。”^⑪嘉靖《颍州志》对当时的焦陂镇记载为:“镇八:州,沈丘……椒陂,南六十里,今废。”^⑫此三条记载联系前引文献综合分析可推知:一、在古城被毁弃之后,后世于故址之旁建成焦陂(城镇),并在隋唐时期编制成镇;二、北宋时期,焦陂镇的繁荣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镇中建佛寺和佛塔,意味着此时人口繁盛,商业发达,时人为铭记此一盛景,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刻石立碑为纪;三、该镇后来又被毁弃,“今镇废而規制尚存”,说明明代正德年间又于废镇旁重建,但在嘉靖年间,又再次遭毁弃。

到清代,康熙《颍州志》对椒陂镇的记载为:“椒陂镇,在南乡六十里,今废。”^⑬但在该志《境图》中却标注有“焦陂集”^⑭,说明废弃的只是镇的規制,但作为人类生活聚集的中心仍然存在。此外,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的皖北方志均把焦陂镇列为一处普通集镇,并无其它详尽描述,可见该镇虽仍存在,但已如皖北其它普通的集镇一样已无繁华之景。

焦陂镇的繁荣、衰落与焦陂塘水利功用的发挥休戚相关。欧阳修《忆焦陂》吟唱的不仅是北宋时期焦陂塘的风光秀丽、物产丰饶,同时也是对岸边焦陂镇繁荣的极大赞誉,镇中建佛寺和佛塔也是明证,说明焦陂镇的繁荣得益于焦陂塘蓄水灌溉和水运功能的极大发挥。即便是在宋金对峙时期,焦陂镇位于金统治之下且处于宋金对峙的前沿区域,虽战火频仍,但因陂塘之佑,仍能

(下转第168页)

①乾隆《颍州府志》卷6《名宦志》。

②《明史》卷83《河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4页。

③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9页。

④乾隆《颍州府志》卷1《舆地志·山水》。

⑤⑩正德《颍州志》卷2《关梁》。

⑥正德《颍州志》卷1《山川》。

⑦成化《中都志》卷3《城郭》。

⑧正德《颍州志》卷1《古迹》。

⑨嘉靖《颍州志》卷6《舆地下·古迹》。

⑪正德《颍州志》卷1《碑碣》。

⑫嘉靖《颍州志》卷6《舆地下·关厢乡图》。

⑬康熙《颍州志》卷2《建置》。

⑭康熙《颍州志》卷首《境图》。

会在复胡近仁时说此报“此间无人看,故不曾见”了^①。

胡适除给倪嗣冲写信外,还托刘道章、关芸农帮忙,同时,又致函同乡友人“意君”,请里中人士进一步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提出控告。此见 11 月 4 日胡适致许怡荪函:

舒炳耀被打死一事,我已作一详函与老倪。前日警务厅长刘道章到京,我也写了一封详函与他,又托关芸农代为转托,想不致完全无效。一面我又写信与意君,请里中人士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控告之用。此次若不推倒老李,真可谓暗无天日了^②!

由此可见,胡适的行动可谓周密。而其中转托刘、关帮忙事,即胡适复胡近仁函中所说“近复托他人帮忙,不久当可发生效力”所指。次年 1 月,恶迹昭彰之李懋延被调往无为县担任县知事,不知这是否与胡适的 10 月 28 日详函及相关活动有关。这种结果,虽与胡适等要求将李“撤职法办”的诉求差距甚大,但李氏毕竟不能再为虐绩溪,这也算部分的胜利了。

通过以上考辨,笔者深深体会到:对任何史料,必须首先要考辨其时间和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才有助于尽可能全面、详尽地还原历史本真。而历史真相越丰满,就

越有助于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

作者简介:宋广波(1970—),男,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事实是,胡近仁 1918 年 10 月 30 日致函胡适时,尚不知两日前胡适曾致函倪嗣冲。所以,胡适在复胡近仁时,提到 28 日致倪函的有关信息。倘不明此,极易对有关史料作出误读,如吴元康认为,“据胡近仁观察,胡适此信所述案情多所浮夸,估计系传言人所误,胡适当不会故意如此。”(《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江淮文史》2007 年第 3 期。)其实,胡近仁说的内容“浮廓”的是在此函之前的“三电”,而不是 28 日之函。另,胡近仁转述胡适母亲要胡适“不必多管闲事”,也是在 28 日函之前的事。

②胡适致许怡荪函,第 62 号。

(上接第 138 页)保持其繁荣,从而成为当时区域内十大镇之一^①。明代至清初,由于焦陂塘仍被用于蓄水灌溉和水运,所以虽然焦陂镇屡遭毁弃,但仍能得以重建。只是有明以来,黄河南泛颍境,颍州域内的湖沼陂塘多遭泥沙淤积,焦陂塘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其基本功能,赖陂塘而兴盛的焦陂镇也因此渐趋衰落,虽然作为一处人类生活聚集的普通集镇仍得延续至今,但与宋时繁盛之景已不可同日而语。

余 论

位于淮河流域的颍州,境内地势平坦,“田土皆平原旷野”^②,且“无高山大阜”^③,因此历史上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域之一。然而,广袤的平原地势,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使其极易发生水旱之灾。因此,从汉魏至唐宋,地方官员重视沟洫的兴修和疏浚,“颍境……田土皆平原旷野,不皆近河,必随地有沟,以达于淮,故魏邓艾始开河渠,唐柳宝积修陂塘,宋苏轼治沟洫,皆以水利为重。”^④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带动了颍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焦陂塘灌溉和水运功能的极大发挥带动了焦陂镇的繁荣即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及至明清,由于黄河屡泛颍境,其内诸多湖沼泥沙淤积,而地方官员对水利的忽视,也加剧和加速了陂塘湮废的程度与进

度,焦陂塘的兴衰只是其中一例。嘉靖《颍州志》即指出了这种情形:“沟洫所以时畜泄,备潦旱,利莫大焉……今之有司多置而不讲,是失轻重之宜矣。”^⑤区域水利设施久无修治,直接影响了颍州地区的农业经济,进而导致区域社会发展滞缓,焦陂镇的衰落即其明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华东地区灾荒环境下的社会治理研究”(10BZS058)和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专项课题重点项目“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水旱灾害资料整理与研究”(12JCZ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焦存超(1982—),男,安徽凤台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陈业新(1967—),男,安徽霍邱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金史》卷 25《地理中》,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98 页。

②⑤嘉靖《颍州志》卷 9《沟洫》。

③道光《阜阳县志》卷 19《艺文志·记》。

④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 67《河渠志·水利》。